

造物观

中国传统

董明利·著

ZHONGGUO CHUANTONG
ZAOWUGUAN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S

造物观

中国传统

董明利·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造物观/董明利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1.12(2022.3重印)

ISBN 978-7-5762-2197-8

I. ①中… II. ①董… III. ①古器物—研究—中国 IV. ①K87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17283号

出版发行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22516
网址	www.juacp.com
印刷	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21年12月第1版 2022年3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762-2197-8
定价	68.00元

赣版权登字-07-2021-14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前 言

造物观是器物与文化结合的产物,在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熟的文化体系,特别是上层社会主导的文化体系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和区域造物者的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进而决定着这一时期和区域器物的造型、工艺、审美特质。概言之,文化统领下的造物就是造物观。中华民族有独立的历史发展空间和未间断的历史延续,拥有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系统,给世界贡献了“东方文明”这一辉煌文化体系。翻开浩瀚的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中华民族既是有文化的民族,又是善于文化造物的民族。从上古的石器、骨器、玉器、陶器到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从秦汉时期的秦砖汉瓦、大型雕塑群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型雕塑群、青瓷,从隋唐五代时期的恢宏巨大的宫殿陵墓、光彩耀目的唐三彩到宋元时期的精美瓷器、草原民族的金银器,从明朝的各类精湛工艺品、辉煌的故宫到清朝中前期的手工艺品巅峰、种种辉煌巨制,都彰显着中华民族造物文化的独特魅力。要认清中国传统造物观的历史脉络,解读方法很重要,历史分期是一种方法,以器物与文化相结合的特征为划分依据的分类是一种方法。现在就这两种维度进行概述性阐述。

一、历史分期下各阶段的造物观

历史分期就是按照中国古代朝代更迭的顺序进行分期,但是历史的特点是,越久远则存世的可依靠资料就越少,越久远则

时间跨度就越长。同时,在战乱分裂阶段,很多地方政权并存,有的存续时间短,影响力有限。在充分考虑这些特殊因素的基础上,历史分期没有严格按照时间进行划分,而是进行了一定的合并。从造物角度看,有十个历史时期:上古至夏时期、殷商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代时期、清中前期。

上古至夏时期的造物观。上古至夏时期是传统造物观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尚未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先民与自然进行搏斗,为生活而拼搏。社会中,蒙昧与占卜共存,仪式与巫术并行,神话与图腾同源。经过上古时期漫长的发展,至夏时,上古文化呈现出强烈的氏族观念和蒙昧开化特征。把上古延续至夏朝作为一个分期进行叙述,是基于它们均处于“文字记载社会万象”之前和血缘氏族的一贯性与延续性。这一时期的造物观特点是:在漫长的上古时期,人们造物基本遵循“服务于生计”;而在迈向文明时期出现了“服务于权力集中”的造物观。

殷商时期的造物观。殷商文明其实是王权贵族阶层的生活写照,法国人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把其称为宫廷文明时期。殷商时期,商王是万国之王,是所有贵族阶层的总领袖,他集祭祀、作战、政治、仪式、经济等大权于一身。商王要不断强化自己的领导地位,还要维护王权贵族阶层的特权,以巩固商王统领下的特权阶层统治。商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通过祭祀仪式强化王权。殷商这一特质对其造物观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造物观特点是:通过夯筑“重大事件威严性”来强化王权的造物观。

西周时期的造物观。周人崛起于渭上,以蕞尔小邦替代大





邑商。与殷商王权至上和族权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不同，周代依靠分封制和宗族制建构起严格的等级社会。由商及周，极大地促进了诸侯国统治模式的大变革，即由商代主轴统治模式向周代共同体模式的转变。殷周政治文化巨变对造物观带来巨大冲击。这一时期造物观的特点是：“以德配天”的天命造物观、“伦理考量”的德性造物观和“礼乐秩序”的等级造物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造物观。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控制力基本丧失，诸侯并起。急剧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贤士集体大思考，“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促进了华夏理性文化思潮兴盛。与之前三代“天至上”思想不同，春秋战国时期，“人”被重视，正所谓“天道远，人道迩”，一远一近，可见端倪。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四处动荡，人本思想、理性思维、社会转型、技术进步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在造物观上呈现出多种文化圈各领风骚且相互交织的繁盛局面。在总体造物观方面，相比之前三代，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抛弃了神秘、原始、蒙昧的主基调，打开了华夏民族的写实、成熟、人本的造物之路。这一时期造物观特点是：实现了中华造物观上的重要转向，“人本主义得以弘扬”；同时，诸侯间的求存图强，客观上促成了造物“百花齐放”。

秦汉时期的造物观。秦汉时期，聚拢人心、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大一统是君王所思虑的大事件，内部要谨防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外部要抵御匈奴的侵袭与骚扰。“维护大一统”是秦汉所有问题的根源，秦汉造物也要服务于此。相比先秦，其最大进步是“高扬人的现实生活”。与秦代统治者追求“永生”的造物理念不同，汉朝“成教化、助风俗”，在社会上刮起了“恶以

诚世、善以示后”的伦理造物观之风。这一时期造物观的特点是：秦代呈现出明显的文化专制主义造物观，汉代则是“儒家与道家二元对立与融合”造物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物观。纵观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社会现实是“无尽的天灾人祸”，这深刻影响到这一时期的造物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彰显“人文关怀和精神寄托”的造物倾向。美好期待、吉祥如意甚至外来佛教都成为这一造物倾向的载体。当然，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多变繁杂的造物时代，三国与两晋、南朝与北朝存在一定差异，以至于很难找到一个代表各方的造物观，又似乎感觉彰显“人文关怀和精神寄托”的造物倾向是主线，因此这一时期造物观特点可归结为：延续汉代且寻求多元变革的三国西晋造物观，人文关怀造物倾向和胡汉杂糅的十六国北朝造物观，魏晋风骨为主与外来元素为辅的东晋南朝造物观。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物观。隋唐五代造物观上的革新与演化得益于繁盛的社会现实和宽容的文化政策。隋唐五代时期在儒学正统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采取宽容政策，佛家通过中国化、道家通过义理化而获得长足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边疆文化和外域文化在中原地区开枝散叶。隋唐五代统治者向世人展示了三个重要的道理：越强大就越开放，越鼎盛就越包容，越统一就越自信。总体而言，隋唐五代造物观以博大清新、恢宏磅礴、富丽堂皇、华丽丰满和自由奔放而著称。这一时期造物观特点是：追求“精神满足”的形上造物观，彰显“繁华盛世”的王朝造物观，体现“开放包容”的多元造物观。



宋元时期的造物观。宋代社会“以文治国”，社会富足，贸易兴盛。两宋传承和弘扬了中华造物观的主脉络，与隋唐五代相比，两宋时期造物去除了雍容华贵之气，转向了幽雅尊贵；去除了宏大磅礴的开阔之势，转向了极简求理的严谨含蓄之意。辽西夏金元发迹于辽阔的北方地区，属于游牧文化，在隋唐五代时期属于最靠近中原文化的“胡文化圈”。雄心勃勃的少数民族领袖发奋图强，对于统一天下而言，“武略”更重要、更有效且更符合游牧文化精神内核，所以相比较两宋崇文而儒雅的社会气质，辽西夏金元则去除了舞文弄墨的儒雅之气，采取强悍英武的尚武精神，去除了追求简约素雅的理学精神，而采取粗犷豪放的刚劲之质。这一时期造物观的特点是：两宋“极简求理”的儒雅造物观与造物中的都市文化并存，辽西夏金元则呈现“粗犷豪放”的刚劲造物观。

明代时期的造物观。明朝社会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对比明显的历史时期，明前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十分突出的时期，社会保守沉寂，而明中后期则在皇权旁落和商品经济发展下出现与前期截然不同的社会风尚。明前期不断强化君主专制让社会造物观都指向权力中心，以服务于“权力至上”为出发点去思考造物的合理性与社会趋向。明中期在生产力发展下，外加中央集权对社会控制的弱化，商业发展推动社会风尚转型，市井再次引领社会，促成明中后期在“锱铢共竞”时代的服务于市井奢靡生活的造物观。这一时期的造物观特点是：前期中央集权加强下呈现“权力至上”造物，中后期锱铢共竞时代呈现“市井奢靡”造物观。

清中前期的造物观。清中前期在造物技术上达到了手工业造物的最高峰,在工艺造物上登峰造极,同时在造物美学境界、现代工业造物等方面缺乏源动力,处于落后状态。清中前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造物观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总结阶段。清后期则急速进入世界工业文明的造物话语体系之中,造物观出现了迷茫、混乱、求变、适应等特征,此时的造物观已经脱离“中国传统”语境而进入“近现代中国”语境。而清中前期造物观的特点是:技术造物游刃有余,创造了手工业造物时代的顶峰水平,以大型园林为代表的景观造物坚持“中体西用”,塑造了世界文明融合的造物典范。

二、器物与文化结合的不同时代造物观

依据“器物反映出的文化特质与文化演变的历史现实”这一维度,突破了史学界普遍认同的历史阶段划分结论,从器物与文化发展演变本身出发,传统造物观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观象制器(上古夏商时期)、纳礼于器(两周秦汉时期)、器以载道(隋唐宋元时期)、道器合一(明清时期)。

观象制器:上古夏商时期器物中的造物观。观象制器语出《周易·系辞传上》“以制器者尚其象”,从上古夏商时期器物代表人面鱼纹盆、日用陶器、青铜立人像、司母戊大方鼎、大玉琮看,“象分为三”:自然之象、社会之象、意识之象,“观而取象”之万物有灵、人人通天、图腾崇拜、巫覡通天、通灵巫术、祭天祀鬼、巫权合一观念,后具象而成器,是为制器尚象。从上古夏商时期出土的众多器物中可以看出,上古先民在造物时基本沿着“观象—取象—造物”的认知过程进行制器,在“取象—造物”的认知





过程中融入“意象—具象—成器”的创造过程。

纳礼于器:两周秦汉时期器物中的造物观。礼制是周灭商后兴起的政治制度,它建立在分封制、世袭制和等级制基础之上。森严的等级制度影响到了周代及以后封建王朝的器物工艺和设计的造物观。秦汉时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现象终归于儒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扶正儒家学说成为官学,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在民间得以生根发芽。从两周的礼乐制度,经历春秋战国的洗礼,至秦汉时期的“成教化、助风俗”,已经充分证明两周秦汉时期纳礼于器的造物观形成。

器以载道:隋唐宋元时期器物中的造物观。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政府采取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在文化上支持儒道佛共同发展,从而促成了三家合流的格局,中华文化形成以儒家为主体、道佛为补充的文化特质。宋元时期,朱熹、张载、程颐、程颢、陆九渊等哲学家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形而上的探究,充分吸收了道佛思想,促进传统文化对“道”的哲学思辨探究并取得“理学”成就。隋唐以来科举开考,儒家经典成为官学,在政治和功名引导下,儒家学说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至宋元时已经形成儒家文化统领社会生活的局面,促使造物领域器以载道的形成。隋唐宋元时期,文化流变趋于稳定,大儒的形而上探求充分吸收道佛思想,在器物文化领域则表现出儒道佛三家文化影响下的造物观。

道器合一:明清时期器物中的造物观。明清时期,稳定而大一统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天朝大国的优越感,朝贡贸易下的器物外销,同时把中华文化也传向西方。王阳明心学开启了儒家文

化的另一扇哲学之门,连同朱熹的理学一起撑起了传统文化的脊梁。文化自信下的造物观达到“道器合一”境界,传统文化已经转化为造物者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器物文化已经具备传承意义上的基因效应。明清时期的器物精品多、数量大,器物在文化上追求儒道佛的经典哲思和伦理道德,在器物上表达儒道佛思想精髓,二者相得益彰,完美融合。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就是这一时期道器合一下器物繁荣的表现。

概言之,中国传统造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正是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才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造物精品。中国传统造物观蕴含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哲学理路、技术水平和文化特质。中国传统造物观的历史是清晰的,内涵是丰富的,范式是独立的,传承是延续的。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上古至夏时期的造物观	001
第一节	基本遵循“服务于生计”的上古造物观	001
第二节	迈向文明时期“服务于权力垄断”的造物观	011
第二章	殷商时期的造物观	017
第一节	重大事件中的殷商器物使用	017
第二节	通过夯筑“重大事件威严性”来强化王权的造物观	024
第三章	西周时期的造物观	030
第一节	天命：周代造物观中的以德配天	030
第二节	伦理：周代造物观中的儒学渊源	034
第三节	等级：周代造物观中的礼乐秩序	038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造物观	043
第一节	人本主义得以弘扬：中华造物观上的重要转向	043
第二节	诸侯间求存图强客观上促成了造物“百花齐放”	051

第五章	秦汉时期的造物观	059
第一节	秦朝文化专制主义造物观	060
第二节	汉代“儒家与道家二元对立与融合”的造物观	067
第六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物观	077
第一节	延续汉代且寻求多元变革的三国西晋造物观	078
第二节	人文关怀造物倾向和胡汉杂糅的十六国北朝造物观	081
第三节	魏晋风骨为主与外来元素为辅的东晋南朝造物观	087
第七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造物观	092
第一节	追求“精神满足”的形上造物观	094
第二节	彰显“繁华盛世”的王朝造物观	100
第三节	体现“开放包容”的多元造物观	107
第八章	宋元时期的造物观	115
第一节	两宋“极简求理”的儒雅造物观与造物中的都市文化	116
第二节	辽西夏金元时期“粗犷豪放”的刚劲造物观	127
第九章	明代时期的造物观	136
第一节	前期中央集权加强下“权力至上”造物观	137
第二节	中后期锱铢共竞时代“市井奢靡”造物观	147
第十章	清中前期的造物观	152
第一节	造物技艺追求完美的“匠人时代”	153
第二节	以园林为载体彰显国威的“中体西用”造物观	163
	参考文献	169
	后记	172

第一章 上古至夏时期的造物观

上古至夏时期是传统造物观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尚未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先民与自然进行搏斗,为生活而拼搏。社会中蒙昧与占卜共存,仪式与巫术并行,神话与图腾关联,神权政治与杀殉祭祀同在,经过上古时期漫长的发展,至夏时上古文化呈现出强烈的氏族观念和蒙昧开化特征。把上古延续至夏朝作为一个分期进行叙述,是基于它们均处于“文字记载社会万象”之前和宗教、氏族的一贯性与延续性。

第一节 基本遵循“服务于生计”的上古造物观

上古时期是指我国祖先从古代类人猿、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逐步开启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再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进入到夏朝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原始蒙昧和拼搏求存是上古时期的总体特质。人类出现,工具起到标志性作用,当先民有意识地对大自然的石器进行改造和打磨,就开启了人类之旅,也开启了造物之路,有意或无意的造物想法在万千上古先民中闪耀。在农业、畜牧业和烧陶业出现之前,石器、骨器和木器共同支撑起了旧石器时代的造物内容。新石器时代,石器仍然是主角,不过石器制造开始精细化地磨制。新石器时代的造物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一改旧石器时代简单粗糙的特点,开始制造比较实用的精致石器、用途广泛的骨角生活用器、火与黏土融合的陶器、做工精细的玉器和比较复杂的居住房屋等。但是不论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上古先民在造物过程中,整体的造物趋向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基本遵循“服务于生计”。

一、旧石器时代：原始造物思维在“拼搏求存”中闪光

上古先民从自然中脱颖而出,过着集体狩猎、采集果实的茹毛饮血的生活,对大自然最常见的石块、木棒进行人为加工,打制粗糙的石器和木器,解决生活所需,与大自然进行着顽强斗争。“正是在这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他们逐渐掌握了加工石器的技术,能够打制出有一定形状而又适用的生产工具。”^①在与自然斗争和寻求种群生存的过程中,人类开启了造物之路。目前已出土的中华先民的打制石器最早来自距今180万年左右的西侯度。1958年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已经学会制造石器和火。在出土的几万件石器中,我们发现“北京人”开始制造石砧、石锥、石球、石锤、砍砸器等。其中,用于刮削木棒、切割动物皮肉的刮削器,其刃口非常锐利,人为打磨和加工的痕迹明显。而同时出土的动物骨骼化石证明了“北京人”广泛进行狩猎活动,狩猎对象以肿骨大角鹿为多。使用火烤肉时,锋利的石器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1973年河北阳原侯家窑遗址出土了一千余件石球(如图1),按其重量分为大、中、小三类,大的在3至5斤,中等的在1至3斤,小的在1斤以下,与其同时大量出土的野马骨骼化石说明了这些石球的用途——用于狩猎时抛掷击打逃跑的野马。据一些研究者猜测,这些石球可与用植物纤维和兽皮制造的绳索一起使用,制成飞索石,有效射程可达50米。



图1 旧石器时代侯家窑遗址出土的石球

^①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艺术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3.



在与自然界搏斗过程中,上古先民对水中畅游的鱼和奔跑能力强的鹿、牛、羊等动物进行捕猎,进化了“生存能力”,制造出石镞、骨鱼镖、投矛器等更有效的捕猎工具。石镞就是早期弓箭的箭头,它在制造之初就要考虑锋利性和大小尺寸以适合射箭需求,在造物过程中,同时还要考虑底部安装箭杆的设计需求,要以实际用途的有效性为主要考虑因素,或有凹字形状或有扁平薄柄。1963年山西峙峪遗址出土的石镞,就是中国旧石器晚期的一个例证。骨鱼镖是捕鱼工具,1983年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了一件比较完整的鱼骨镖,这件鱼骨镖的头部呈现扁锥体形状,主干呈现棱柱体形状且在两侧各有一个或两个倒钩,根部削薄,整件鱼骨镖造物设计比较实用和巧妙,是在长期捕鱼过程中磨砺出的实用工具。伴随捕猎获取的动物骨数量增加,骨器的制造和用途得以提升,其中骨针是一个代表,它最大的用途是缝制兽皮成衣,以抵御严寒。同样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中出土了3枚保存完整的骨针,骨针的针孔圆滑,针身平直,是穿针引线的良器。

当然,在旧石器时代,上古先民为了生计制造了大量的工具,原始造物思维在与自然界“拼搏求存”中得以闪光。一些石器、骨器不仅实用,也包含了有意或无意的造物思考,存在“实用性之外的考究”。这种考究直接体现在古朴的装饰品造物过程中,装饰品已经超越了服务于生计的范畴,走向了艺术和宗教之路,而这条路更能够反映上古先民的造物思维。1930年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出土的装饰品占据一定数量,包括钻孔石珠、穿孔鱼骨、穿孔动物牙齿、穿孔海蚶壳、穿孔砾石等,这些穿孔装饰品显然不是为了生计,而是对生活艺术的追求,或是为了宗教意味中的辟邪之用。在山顶洞下室墓葬中,发现了随葬的穿孔动物牙齿和穿孔海蚶壳,并撒了象征“死者复生”观念的赤铁矿粉。山顶洞人对穿孔技术的热爱和诸多用于装饰品和随葬品的穿孔器,促进了造物技术提升和造物观念生成,以及在此基础上萌发的“某种器物独有的巫术、辟邪和驱病”的特殊认知。“穿孔装饰品的发达,表明人们已有趋利避邪的巫术概念和爱美的意识。”^①上古先民的美术与宗教造物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

^① 郑师渠,王冠英. 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0.

二、新石器时代:原始造物理念呈现出特权化和仪式化特质

就石器的制造而言,以打制方式制造石器的时代是旧石器时代,以磨制方式制造石器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石器仍是上古先民使用最广泛的工具。不过伴随着人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向中晚期发展,制陶业和玉器制造业开始兴起,上古先民造物理念中通过技术提升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用具的技术化路线逐步明确,火与黏土成为主角。在选取石料过程中,大自然中馈赠的纹理细腻、色泽晶莹剔透的“玉质石头”,成为上古先民对美的追求和仪式化用途的优质选择。玉器制造业在石器制造体系中逐步分离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工艺种类发展起来,并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田自秉对此表示:“由此可见,石器和玉器不仅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玉器工艺就是由石器工艺发展演变而来的。例如,玉圭是由石斧演变而来;玉璧是由环状石斧演变而来;玉璋是由石刀演变而来;等等。”^①玉器工艺得以发展的动力除了对美的追求之外,就是宗教。从这一时期大量出土的文物来看,很多玉器是随葬品,应该是墓主人生前所常用的器物且很珍贵。最典型的玉雕艺术就发现于红山文化,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用于祭祀的“女神庙”,这说明红山文化祭祀仪式气氛浓厚。其遗址发现的几处石冢(如图2),随葬了一些玉器。不同类别的玉器按照一定的



图2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1号冢21号墓

^① 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5-6.